

我国转型期各地就业质量的测算 与决定机制研究*

苏丽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 100029)

摘要:通过建立地区层面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本文对我国转型期各地区就业质量进行测算,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从宏观视角对就业质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除了东部少数经济发达的地区外,全国就业质量的总体水平不高,且地区间就业质量差异明显,这种差距并没有随着转型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缩小。同时发现,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以及就业法规、劳动合同、社会保护等制度设计是促进就业质量提升的最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就业政策、高招政策则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现阶段的户口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影响则非常微弱。

关键词:就业质量 转型期 决定机制 面板数据

一、引言

就业问题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近年来全球经济低迷,就业问题突出,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球有2亿多人失业,且预计2013年全球失业率将升高至6.2%,会有另外500万人失业。与此同时,实际工资增长趋缓,工业化国家则出现负增长,对就业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在此背景下,我国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指出,当前用人需求有较大幅度增长,但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力资源配置的矛盾仍然突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而且劳动争议增多,就业质量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新主题。

就业质量的概念最早源于国际劳工组织上世纪90年代年提出的体面劳动,是指劳动者在自由、平等、保证安全和个人尊严的前提下,获得体面、高效的工作机会。之后国际组织和国外学者对就业质量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但侧重不同,Schroeder(1994)认为就业质量涵盖劳动者的工作效率、职位匹配程度、薪酬水平等微观因素;Bastelaer(2002)认为就业质量是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及资源配置效率的反应,包括劳动力供求状况、公共就业服务质量等;从工作特征和劳动力市场两个视角进行概念的界定。国内对就业质量概念的研究则主要针对就业质量涵盖的具体指标展开,例如对工资、工作条件、社会保障等方

*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转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搜寻与就业问题研究(70903074)”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级科研课题“职业教育的扶贫效应研究(12YBJX10)”资助。

面的重点关注（郭丛斌，2004；柯羽，2007）。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应用了统计分析和对某一群体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两种方法（李实，2001；赖德胜等，2011）。总之，目前来看就业质量概念的界定尚未统一，已有研究大多按照分析的目标群体，引入相应的概念和指标体系，而且研究方法也各有侧重。

诚然，国内专门针对就业质量的研究相对缺乏，宏观层面的就业质量文献更是凤毛麟角。但事实上，在我国还存在着诸多阻碍就业质量提升的桎梏，例如：第一，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推进，减员、竞争压力等都可能让公众感觉到就业质量在降低；第二，短期工程的开发使得不稳定就业增加；第三，技能偏态型技术进步导致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更加困难；第四，人口老龄化、妇女更多地参与工作使得家庭照顾负担加重，对工作生活平衡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而也正在削弱就业质量。另外，工作压力、劳动强度、健康等影响个人与家庭和谐的问题，都要求对就业质量投入更多的关注。国家“十二五”规划指出要提高就业质量，让劳动者体面就业，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要在新时期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因此，研究我国的就业质量问题具有较强的制度背景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思路与假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末，非国有企业迅速成长吸纳大量就业，同时国企改革减员引起社会再就业矛盾突出。第二阶段是本世纪以来，经济结构快速转型，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就业、大学生就业等问题凸显，但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差距迅速加大，造成低质量就业增加。具体来说，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正规部门就业人数减少，而包括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and 城市失业者在内的非正规就业人数大幅增加，导致了劳动报酬较低、工作稳定性差、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就业质量低下问题日益突出。农民工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特殊的劳动群体，其就业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而大学生就业的主要问题是职业偏好与市场需求的区域匹配度差、专业匹配度差，主要源自择业观念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双重诟病，因此存在较为严重的自愿性失业问题。

因此，一方面我国实行的国企改革、下岗分流、打破“铁饭碗”的思想对新时期劳动力市场形成了深刻影响，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也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针对上述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政策、法规，使原有的城乡、部门分割日渐被趋于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所取代，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不断增强，成为就业质量逐步改善的特殊时期。因此，该时期就业质量的内涵既包括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因素对劳动力市场运行、就业数量、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影响，还包括劳动者教育、培训机会增加等因素。所以，对地区层面就业质量的分析应该从就业环境、教育水平、工资水平、社会保护、劳动关系等多个维度入手，以全面反映经济水平差异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总之，我国转型时期的每一次制度调整都对就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效果不尽相同，本文正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对就业质量产生何种作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之下，来探究相关因素的影响效应。文章的基本假设是：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对地区层面就业质量具有明

显的正向影响。研究脉络：首先建立指标体系测算就业质量指数；然后，选取相应的解释变量，对就业质量指数进行回归分析，考察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机制；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各地区就业质量的测算

(一) 指标体系说明

对就业质量的测算是已有研究的拓展。2011 年我们在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 6 个维度指标,20 个二级指标和 50 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赖德胜、等,2011)。为了保持研究的连续性,本文沿用已有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依据,但削减了部分有明显相关性的指标。同时考虑研究的时间跨度由原先的两年扩展至十年后部分指标数据的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使得指标不具可比性,以及某些年份回溯数据不完整的问题,在保证测算体系稳定的条件下,本文筛选并最终确定了包含 39 个三级指标的测算体系(见表 1),指标构建依然遵从维度完整、逻辑清楚、特征明确、数据可得、度量可行的原则。

(二) 数据和计算过程

要测算和反映就业质量的客观水平,比须强调数据的公开性和权威性,有鉴于此,本文将国家统计数据作为基本数据来源,相关数据库主要包括 2000 至 2010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月报》、《中国发展报告》等。

为了使就业质量跨年度可比,须首先设定基期年份(2000 年),并设定基期年份各单项指标评分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1 和 0,然后根据各地区基期年份的指标值计算它们的得分。为了保证指标得分和就业质量高低在经济含义上保持同向,本文利用线性功效函数计算基期年份指标的标准化得分,其中正相关指标得分公式为(1),负相关指标得分公式为(2):

$$Score_i = (X_i - X_{\min}) / (X_{\max} - X_{\min}) \quad (1)$$

$$Score_i = (X_{\max} - X_i) / (X_{\max} - X_{\min}) \quad (2)$$

其中 $Score_i$ 代表第 i 个指标的得分,取值在 0~1 区间内, X_i 是第 i 个指标的原始数据, X_{\max} 是第 i 个指标在全国 31 个地区中原始数据的最大值, X_{\min} 是第 i 个指标在全国 31 个地区中原始数据的最小值。由上式可知,标准化以后的得分均与就业质量正相关,即得分越高,就业质量越高,反之就业质量越低。为了使各地区不同年份就业质量可比,从而反映其变化趋势和幅度,对后续年份的指数得分采用如下公式计算。正向指标得分公式为(3),负向指标得分公式为(4):

$$Score_{i(t)} = (X_{i(t)} - X_{\min(0)}) / (X_{\max(0)} - X_{\min(0)}) \quad (3)$$

$$Score_{i(t)} = (X_{\max(0)} - X_{i(t)}) / (X_{\max(0)} - X_{\min(0)}) \quad (4)$$

其中, t 表示当期年份,0 表示基期年份,其他变量含义与公式(1)(2)相同。

在北京师范大学“就业质量研讨会”上曾有专家建议适当减少存在相关性的部分指标,本文删减的 11 个指标大部分是当时讨论认为有异议的指标。

就业质量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要用数量化的方法加以度量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我们选取了 39 个指标来合成就业质量指数，实际上是一个由多指标到单一指数的降维过程。常见的方法有打分法、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其中打分法和层次分析法的计算过程都包含有主观判断环节，有失客观性，而主成分分析法只能适用于单一年度的权重测算。为了避免主观因素的干扰，并满足年度指数可比，本文选择算术平均加权法作为“各地区就业质量指数”的基本合成方法。需要说明的是利用该方法并非最终目的，而只是对指标合并，进而方便对结果作进一步的分析。按照上述方法，使用 Stata 软件将 39 个三级指标合成 20 个二级指标，进一步合成 6 个维度指标，最终合成地区总指数，公式为 (5)：

$$Index = \sum_{i=1}^{39} (weight_i \times score_i) \quad (5)$$

其中 $Index$ 表示所在地区的就业质量指数值， $weight_i$ 为所在地区第 i 个指标权重， $score_i$ 是所在地区第 i 个指标的得分。指标体系和权重见表 1。

表 1 中国各地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和权重分配

维度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1 就业环境	1/6	1.1 经济发展与就业	1/4	1.1.1 就业弹性	1
		1.2 就业服务	1/4	1.2.1 人均职业介绍机构数量	1/5
				1.2.2 职业介绍机构平均指导人数	1/5
				1.2.3 职业介绍机构服务效率	1/5
				1.2.4 人均就业培训投入	1/5
				1.2.5 人均就业培训机构数	1/5
		1.3 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	1/4	1.3.1 外地户口与本地户口人口比例	1
		1.4 劳动力供需	1/4	1.4.1 劳动力需求与供应比例	1/2
1.4.2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	1/2				
2 就业能力	1/6	2.1 教育发展水平	1/2	2.1.1 人均教育经费	1/2
				2.1.2 劳动力受教育年限	1/2
		2.2 培训	1/2	2.2.1 劳动力接受培训的比例	1/2
				2.2.2 技工比例	1/2
3 就业状况	1/6	3.1 就业机会	1/6	3.1.1 劳动参与率	1/2
				3.1.2 失业率	1/2
		3.2 就业结构	1/6	3.2.1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1/2
				3.2.2 城镇就业比重	1/2
		3.3 就业效率	1/6	3.3.1 就业效率	1
		3.4 就业稳定性	1/6	3.4.1 单位就业比例	1
3.5 就业公平	1/6	3.5.1 行业工资差距	1/2		
		3.5.2 所有制工资差距	1/2		

续表 1

维度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名称	权重
3 就业状况	1/6	3.6 工作安全	1/6	3.6.1 职业病发生率	1/3
				3.6.2 工伤事故发生率	1/3
				3.6.3 工伤事故死亡率	1/3
4 劳动者报酬	1/6	4.1 劳动者工资性收入	1/4	4.1.1 工资水平	1/2
				4.1.2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1/2
		4.2 工资增长情况	1/4	4.2.1 工资增速	1
		4.3 收入分配	1/4	4.3.1 工资总额占 GDP 比重	1
		4.4 劳动报酬	1/4	4.4.1 制造业平均劳动报酬	1/2
				4.4.2 建筑业平均劳动报酬	1/2
5 社会保护	1/6	5.1 社会保险	1/2	5.1.1 平均社保参保比例	1/2
				5.1.2 人均财政社保支出	1/2
		5.2 社会保障	1/2	5.2.1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	1/2
				5.2.2 养老保障负担	1/2
6 劳动关系	1/6	6.1 工会建设	1/2	6.1.1 工会参与率	1/2
				6.1.2 工会调解效率	1/2
		6.2 劳资关系	1/2	6.2.1 人均劳动争议发生率	1/3
				6.2.2 集体劳动争议当事人人数占比	1/3
				6.2.3 劳动争议结案率	1/3

注：各级指标权重之和为 1，二级指标权重为占维度指标比例，三级指标权重为占二级指标比例。

（三）测算结果分析

利用上述方法，本文对 2000 至 2010 年中国大陆 31 个省份的就业质量指数进行了测算和排序，见表 2。结果显示，我国转型时期就业质量排名靠前的地区主要有北京、上海和天津，是综合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说明对于就业质量而言，同样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分割。在我国经济从计划到市场逐步深化过程中，虽然不断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城乡、行业、所有制等部门分割，就业的公平性逐渐得到提升，但在发展过程中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并未显著缩小，甚至中西部与东部特大型城市的差距还有所扩大，因而产生了地域之间发展不协调的现象，致使就业的制度完善程度及其落实情况参差不齐，就业环境、劳动者报酬、社会保护等影响就业质量的诸多因素差异明显。

表 2 中国各地区就业质量指数和排名（2000-2010 年）

排序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1	北京 0.706	北京 0.883	北京 0.980	北京 0.915	北京 0.876	北京 0.825	北京 0.958	北京 1.271	北京 1.371	北京 1.159	青海 1.579
2	上海 0.625	上海 0.795	上海 0.752	上海 0.805	上海 0.841	上海 0.798	上海 0.941	上海 1.111	上海 0.989	青海 1.011	北京 1.230

续表 2

排序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省份	值	省份	值	省份	值	省份	值	省份	值	省份	值	省份	值	省份	值	省份	值	省份	值	省份	值
3	天津	0.533	天津	0.686	天津	0.647	天津	0.747	天津	0.757	天津	0.697	天津	0.811	天津	0.915	天津	0.880	上海	0.982	上海	1.009
4	广东	0.503	广东	0.568	新疆	0.566	江苏	0.645	广东	0.623	辽宁	0.612	辽宁	0.680	辽宁	0.796	青海	0.852	天津	0.877	天津	0.969
5	新疆	0.490	新疆	0.563	广东	0.544	浙江	0.573	新疆	0.601	西藏	0.603	广东	0.656	黑龙江	0.739	辽宁	0.820	辽宁	0.826	内蒙古	0.888
6	浙江	0.463	辽宁	0.561	辽宁	0.532	新疆	0.548	辽宁	0.597	青海	0.588	浙江	0.646	广东	0.710	黑龙江	0.747	内蒙古	0.819	辽宁	0.874
7	辽宁	0.458	宁夏	0.553	黑龙江	0.531	黑龙江	0.542	吉林	0.589	浙江	0.578	江苏	0.640	青海	0.701	内蒙古	0.708	新疆	0.813	新疆	0.846
8	宁夏	0.451	浙江	0.534	宁夏	0.528	辽宁	0.534	浙江	0.574	新疆	0.576	黑龙江	0.637	吉林	0.697	新疆	0.704	山东	0.795	江苏	0.815
9	山西	0.439	黑龙江	0.498	吉林	0.520	广东	0.529	黑龙江	0.557	江苏	0.574	湖北	0.634	江苏	0.696	广东	0.694	江苏	0.773	陕西	0.809
10	甘肃	0.437	青海	0.491	浙江	0.517	山东	0.516	青海	0.544	湖北	0.562	山东	0.613	浙江	0.689	江苏	0.683	湖北	0.750	湖北	0.808
11	黑龙江	0.435	陕西	0.482	湖北	0.498	湖北	0.513	江苏	0.541	内蒙古	0.559	福建	0.607	湖北	0.688	浙江	0.667	黑龙江	0.743	西藏	0.808
12	福建	0.433	湖北	0.479	陕西	0.491	青海	0.513	湖北	0.528	广东	0.552	青海	0.606	内蒙古	0.676	西藏	0.666	浙江	0.727	重庆	0.807
13	陕西	0.429	福建	0.475	山东	0.488	吉林	0.511	山东	0.525	甘肃	0.536	新疆	0.582	重庆	0.647	吉林	0.662	广东	0.724	山东	0.798
14	青海	0.429	江苏	0.473	福建	0.488	福建	0.484	宁夏	0.522	山东	0.529	内蒙古	0.579	山东	0.633	山东	0.662	陕西	0.717	海南	0.794
15	山东	0.423	山东	0.471	青海	0.487	重庆	0.482	甘肃	0.522	山西	0.528	宁夏	0.576	福建	0.631	湖北	0.658	吉林	0.717	山西	0.788
16	江苏	0.418	内蒙古	0.461	重庆	0.483	西藏	0.473	重庆	0.514	宁夏	0.525	重庆	0.570	陕西	0.613	重庆	0.658	重庆	0.711	黑龙江	0.785
17	内蒙古	0.409	吉林	0.454	江苏	0.482	宁夏	0.469	内蒙古	0.511	陕西	0.525	吉林	0.566	河南	0.608	江西	0.657	海南	0.699	浙江	0.770
18	云南	0.407	山西	0.454	甘肃	0.475	陕西	0.467	山西	0.504	黑龙江	0.520	山西	0.562	新疆	0.605	宁夏	0.655	江西	0.694	吉林	0.755
19	湖北	0.406	重庆	0.450	内蒙古	0.451	山西	0.464	福建	0.486	吉林	0.517	湖南	0.556	湖南	0.604	陕西	0.646	甘肃	0.684	广东	0.752

续表 2

排序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省份	得分	省份	得分	省份	得分	省份	得分	省份	得分	省份	得分	省份	得分	省份	得分	省份	得分	省份	得分	省份	得分
20	河南	0.402	河北	0.449	河北	0.451	甘肃	0.463	西藏	0.485	海南	0.512	陕西	0.546	安徽	0.596	云南	0.643	西藏	0.664	江西	0.741
21	贵州	0.398	湖南	0.449	西藏	0.446	海南	0.462	河北	0.481	福建	0.497	河北	0.531	宁夏	0.594	湖南	0.641	福建	0.664	四川	0.728
22	河北	0.397	江西	0.446	山西	0.439	内蒙古	0.453	河南	0.476	河南	0.494	河南	0.526	山西	0.586	甘肃	0.640	宁夏	0.661	宁夏	0.716
23	重庆	0.394	四川	0.436	河南	0.436	河南	0.450	陕西	0.468	重庆	0.491	广西	0.519	四川	0.576	福建	0.628	山西	0.660	河南	0.708
24	吉林	0.393	甘肃	0.427	江西	0.431	河北	0.438	四川	0.468	湖南	0.487	海南	0.519	海南	0.570	四川	0.613	四川	0.655	福建	0.706
25	湖南	0.385	云南	0.423	湖南	0.428	江西	0.429	江西	0.463	河北	0.486	江西	0.514	河北	0.566	河南	0.613	河南	0.644	甘肃	0.696
26	四川	0.380	河南	0.423	海南	0.414	安徽	0.421	海南	0.463	江西	0.485	西藏	0.514	江西	0.553	海南	0.587	云南	0.642	云南	0.691
27	海南	0.378	海南	0.422	四川	0.411	广西	0.414	湖南	0.441	四川	0.458	甘肃	0.511	西藏	0.545	河北	0.587	湖南	0.636	安徽	0.681
28	广西	0.374	安徽	0.420	广西	0.408	湖南	0.412	贵州	0.441	广西	0.448	四川	0.509	广西	0.534	安徽	0.585	安徽	0.613	湖南	0.672
29	江西	0.369	西藏	0.415	安徽	0.398	四川	0.411	安徽	0.439	安徽	0.416	贵州	0.498	甘肃	0.530	山西	0.584	河北	0.594	河北	0.628
30	安徽	0.362	广西	0.340	贵州	0.398	贵州	0.406	广西	0.439	云南	0.413	安徽	0.483	云南	0.522	广西	0.554	广西	0.549	贵州	0.617
31	西藏	0.317	贵州	0.273	云南	0.392	云南	0.391	云南	0.427	贵州	0.412	云南	0.479	贵州	0.496	贵州	0.530	贵州	0.439	广西	0.605

对具体指标分析发现,上述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就业服务、劳动力需求、教育发展水平、工资增长、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指标得分均明显较高,然而,本文也发现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地区在劳动合同的实施的监管、劳动关系协调等方面的制度还不够健全,对就业稳定性、就业公平等极为重要的就业质量要素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劳资关系的结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发生了剧烈变化,劳资冲突更加频繁,特别是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劳资冲突矛盾尤为突出,不仅影响了就业质量,还波及到社会稳定。

从就业质量的动态变化看,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的就业质量上升较快,新疆因具有较高的就业弹性、就业效率及劳动力需求,就业质量指数也较高。排名靠前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则因其作为老工业基地,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占比相对较大,表现为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险两项指标得分较高,所以就业质量的总体水平较高。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内蒙古和重庆就业质量上升幅度最大,一方面因为经济较快增长带动了就业环境快速改善,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就业政策和配套措施较好,比如创造新的高质量就业岗位来吸引就业以及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三级指标表明,内蒙古和重庆的劳动争议发生率、工伤事故发生率等反映劳动关系和劳动安全方面的指标明显占优。排名靠后的贵州、广西、云南因发展相对落后,就业吸引力有限,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城镇就业比重较低,以及反映就业能力和就业服务的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劳动力接受培训比例等指标也相对落后,所

以总体上与东部地区的就业质量差距较大。

总之,就业质量指数反映了我国各地区转型过程中就业质量的水平及变化,对该指数的分析仅局限于对其指标本身的解释。事实上,就业质量根本上受制于各地经济和制度因素,因而要寻找提高就业质量的对策,还必须通过回归分析对相关因素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

四、就业质量的决定机制分析

(一) 解释变量的选取

本文主要在综合国内外就业质量研究基础上,借鉴宏观经济因素分析的经验做法,确定就业质量的解释变量。

1. 人均 GDP:人均 GDP 水平通过影响城市化进而影响城市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因此,该指标被广泛用来评价和比较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也是就业质量的重要解释因素。

2. 市场化程度: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对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贡献,且贡献度呈现东部增加、西部降低、中部为负的区域特征(王丽英,2010)。一般来说,这种区域贡献特征会对就业机会、劳动报酬产生影响,因而与就业质量关系密切。

3. 产业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关系,Kuznets(1971)发现二者既相互联系又不完全同步变化。与之相比,国内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产生了明显影响(黄洪琳,2008),因而可以预期其对就业质量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

4. 对外贸易:从研究结果看,一类文献认为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对就业产生了促进作用;另一类则发现对外贸易水平的提高同样提高了企业的筛选意愿和劳动者工作搜寻的匹配成本,从而对就业产生阻抑作用。借鉴已有经验,本文利用进出口总额作为代理变量来详细考察对外贸易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

5. 利用外资:王成歧等(2002)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有积极影响;Salisu(2002)则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本文选择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利用外资的替代变量,预期其对会就业质量产生明显影响。

6. 就业政策:Calmfors et al.(2002)发现积极的就业政策降低了失业率,但同时也使得正规就业岗位减少,Marcello(2003)则认为积极的就业政策有效提高了经济部门的就业率,赖德胜等(2011)发现我国积极的就业政策对再就业产生了明显促进作用。本文则利用该变量着重考察其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是对已有研究的拓展。

7. 就业法规:针对新时期出现的就业困难问题,国家于2007年8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就业法》,通过法律形式将就业工作制度化,对解决我国劳动力供求及市场结构性矛盾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预期就业法规的实施对就业质量产生明显促进作用。

8. 劳动合同:我国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有利于劳动双方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劳动力流动的的稳定化和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但也有观点认为,该法的实施减少了流动就业岗位的数量、增加了企业用工的门槛,给就业带来了消极影响。本文着重寻找《劳动合同法》对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

9. 社会保护:社会保护制度的健全程度是就业质量的重要标志。

10. 户口制度：户口是限制农村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而且户口对于劳动者工资、晋升和劳动关系等方面的差异有显著影响（蔡昉等，2001；姚先国、赖普清，2004；陆益龙，2008）。我国自2002年起推行户籍改革，到2008年底已有13个省份取消“农业户口”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那么户口改革对就业质量是否有明显影响？本文认为在当前户籍管理制度的转型期间，仅仅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称谓上的区别，并不会对就业质量产生实质性促进作用。

11. 高招政策：1999年开始的新一轮高等教育扩展，极大地提高了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提高工资水平。但劳动力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却相对下降，使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问题凸显（吴要武、赵泉，2010；苏丽锋、孟大虎，2011）。所以总体来看，高等教育的扩展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两面性，因而有必要将该变量纳入进来作详细分析。

（二）数据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各地就业质量指数，与之一致，解释变量所用的数据也主要来自2000年至2010年全国31个地区的统计数据、相关法律法规。其中，人均GDP、产业结构、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的数据来自统计数据，就业政策、就业法规、劳动合同、社会保障、户口制度、高招政策变量是根据各地相关法律开始实施的年份转换成的虚拟变量，而市场化程度则主要参照了樊纲等编写的《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指数。个别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补齐。连续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3。

表3 连续变量面板数据统计描述

变量名称	统计区间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就业质量 (指数)	全体	0.5928235	0.1712789	0.27304	1.57856	341
	组间		0.1175047	0.446251	1.015621	31
	组内		0.1262347	0.282733	1.462398	11
人均GDP(对数)	全体	4.445296	0.5304096	3.399108	5.996607	341
	组间		0.5308503	3.473102	5.800875	31
	组内		0.088434	4.071923	4.836123	11
市场化程度 (指数)	全体	6.547474	2.443716	0	14.26429	341
	组间		1.916024	2.679351	10.35078	31
	组内		1.551959	1.946694	10.46098	11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比重%)	全体	39.60881	7.237966	28.6	75.5	341
	组间		6.876111	30.10713	67.13587	31
	组内		2.549091	30.77294	48.41015	11
对外贸易 (进出口总额对数)	全体	6.651461	1.827596	2.063231	10.90385	341
	组间		1.750329	3.004423	10.3229	31
	组内		0.6054439	5.321662	8.030603	11
利用外资 (外商直接投资对数)	全体	5.170371	1.59431	1.098612	8.533263	341
	组间		1.535498	1.415293	7.985468	31
	组内		0.5034057	3.801509	6.613972	11

（三）模型设计与检验方法

本文数据是由2000至2010年31个地区构成的既存在时间序列又包含截面数据的典

型的面板数据类型 (Panel Data), 共 341 个观测值。因此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 包括随机效果模型 (Random Effect) 和固定效果模型 (Fixed Effect), 基本形式如下:

$$y_{it} = X_{it}\beta + v_{it}, (v_{it} = c_i + u_{it}, t=1 \cdots T) \quad (6)$$

$$y_{it} = X_{it}\beta + c_i + u_{it}, (t=1, \cdots, T) \quad (7)$$

通常, 计量估计时通过模型检验来确定使用哪种模型, Hausman 检验可以观察到 RE 和 FE 的效果差异, 设 X_{it} 是只包含时间变化的解释变量, $H_0: \beta_{FE} - \beta_{RE} = 0$, 则 Hausman 统计量为 (3):

$$H = (\hat{\beta}_{FE} - \hat{\beta}_{RE})' \left(Avar(\hat{\beta}_{FE}) - Avar(\hat{\beta}_{RE}) \right)^{-1} (\hat{\beta}_{FE} - \hat{\beta}_{RE}) \quad (8)$$

拒绝 H_0 , 意味着两个估计有显著差异, 即认为潜在变量 c_i 与 X_{it} 某些解释变量是相关的, 应当采用固定效果的方法。

(四) 回归结果分析

使用 Stata 软件定义面板数据, 并通过了平稳性和协整检验, 最后利用 FE 和 RE 模型分别回归, 结果见表 4。表中 RE 的 $P < 0.05$, 表明 RE 优于混合效应模型, 因此无需混合效应模型分析。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 $F > 0$ 且 $P < 0.05$, 表明 FE 优于 RE。而且 FE 与 RE 的个体效应值分别为 0.17、0.04, 两个模型的随机干扰值均为 0.06, FE 的相关关系检验为 0.86, RE 为 0.29, FE 大于 RE, 进一步验证了 FE 的可信度, 所以总体来看 FE 的回归结果更可靠。另外 FE 模型通过了 F 检验、Wald 异方差检验和自相关检验, 表明 FE 模型整体显著、且不存在明显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

从回归结果看, 人均 GDP、市场化程度、就业法规、劳动合同、社会保护的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人均 GDP 的系数为 0.167, 表明人均 GDP 水平每提高 1%, 就业质量会提高 0.167。这主要是因为 GDP 的增加, 不仅有利于改善就业环境, 提高就业弹性, 同时还会对所在地区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工作环境改善等方面提供经济支撑, 所以这一结果表明, 提高人均 GDP 水平是提高就业质量的基本前提。在市场化程度方面, 结果显示市场化指数每增加 1, 就业质量指数会提高 0.0247, 影响较小。但这种显著的正向关系却可以说明, 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深入有利于提高就业质量, 尤其是随着市场配置资源能力的不断增加, 对打通劳动者求职渠道、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具有积极作用。同时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都会从不同角度作用于就业环节, 削弱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 改善就业结构, 使劳动者与雇主在较高质量水平上达到供需平衡的就业状态。

就业法规的回归系数显示, 就业法规的实施每年可以推动就业质量提高 0.0827, 且影响显著。劳动合同变量系数表明, 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显著, 每年可以促进就业质量提高 0.0517。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 劳动用工领域出现了劳动合同短期化、滥设违约金等不规范现象, 影响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 而劳动合同制度在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同时, 侧重于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以实现双方博弈的相对均衡, 提高就业质量。社会保护回归结果表明, 社会保护制度的健全每年可以促进就业质量提高 0.0526。我国在转型时期逐步完善社会保护制度, 先后颁布了《失业保险法》、《社会保障法》、《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随着社会保护制度的不断完善, 劳动者就业的保障水平也逐步提高。

表 4 各地就业质量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指数

解释变量	具体指标	模型一：FE	模型二：RE
人均GDP	人均GDP水平对数	0.167***	0.0686
		(6.40)	(1.52)
市场化程度	市场化指数	0.0247**	0.0380***
		(3.12)	(4.48)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比重	0.00193	-0.00275
		(1.63)	(1.68)
对外贸易	进出口总额对数	-0.0142	0.0330
		(-1.14)	(1.15)
利用外资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数	-0.0181	0.0233
		(-1.52)	(1.60)
就业政策	积极的就业政策	0.0200	-0.0294
		(1.18)	(-1.70)
就业法规	促进就业法	0.0827***	0.0368*
		(5.18)	(2.27)
劳动合同	新劳动合同法	0.0517**	0.0504**
		(3.04)	(3.14)
社会保护	社保制度改革	0.0526***	0.00659
		(3.76)	(0.40)
户口制度	取消农业户口划分	-0.00571	-0.00556
		(-0.40)	(-0.39)
高招政策	扩招	0.0275	0.0101
		(1.68)	(0.66)
常数项		0.218***	-0.200
		(4.19)	(-0.80)
个体效应 sigma_u		0.16789221	0.04252681
随机干扰 sigma_e		0.06656259	0.06656259
相关关系 rho		0.86416925	0.28986997
R方 within = between = overall =		0.7555	0.7185
		0.2314	0.7366
		0.3663	0.7259
F检验 F(30, 299) = Prob > F =		8.22	
		0.0000	
Wald异方差检验		chi2 (31) =1309.49	
		Prob>chi2 =0.0000	
自相关检验		F(1,30) =13.910	
		Prob > F =0.0008	
Hausman检验		chi2(11) = 113.70	
		Prob>chi2=0.0000	
随机效应检验			chi2(1) =77.71
			Prob > chi2 = 0.0000
样本量N		341	

注：(1) 括号中为 T 值。(2) *代表 $p < 0.05$, **代表 $p < 0.01$, ***代表 $p < 0.001$ 。

回归结果中，产业结构、就业政策、高招政策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系数为正。第三产业作为服务性产业，其具有就业容量大、公共机构多等特点，所以相比而言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会在总量上改变就业质量的构成特征，提升总体就业质量的水平。另外，我国 2002 年开始实施的积极就业政策、1999 年实行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对就业质量的提升也有正向作用。但扩招一方面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提高就业能力，所以对就业质量就正向作用，但同时也加大了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削弱了其正向作用，所以是其总体影响并不显著。最后，对外贸易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其对就业质量没有正向影响，这可能与出口企业用工条件较为苛刻以及用工的规范程度不高有关。同样利用外资、户口制度对就业质量均无正向影响，表明外资的“挤出”效应对我国第一、二产业就业影响不利，而且只改变户口称谓而不进行就业条件改善的户籍制度调整并未对劳动者就业质量产生积极效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提升就业质量是经济社会发展惠及普通百姓的重要途径。对我国 2000 至 2010 年各地区就业质量进行全面测算与回归分析发现，除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少数经济发达的地区外，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就业质量提升缓慢，且地区间差异明显，这种差距并没有随着转型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缩小。同时，经济发展、市场化程度和与就业有密切联系的就业法规、劳动合同、社会保护等制度设计是促进就业质量提升的最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就业政策、高招政策则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现阶段的户口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影响则非常微弱。基于此，文章的政策建议主要有：

第一，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适当地利用计划调节，逐步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改善就业环境，逐步加快中西部地区就业质量提升的速度，建立地区间高效一体的劳动力市场。

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尤其要注重就业服务、就业公平、劳动关系等相关制度的建立，将就业质量作为经济发展惠及民生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让就业质量的提升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第三，提高市场化程度，强化市场分配资源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打通劳动者求职渠道、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改善劳动关系，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使劳动者与雇佣者在较高质量水平上达到供需平衡的就业状态。

第四，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就业质量的提升提供保障，同时，继续落实社会保护方面的相关政策，尤其要注意将那些尚未纳入社保体系的群体尽快覆盖进来，因为从现阶段来看，解决就业质量偏低群体的社会保护问题是提高他们就业质量的主要方式。

第五，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第三产业对就业质量的带动作用。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彻底将附着于户口上的分割因素剥离开来，保证劳动者外部就业条件的一致与公平。加快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从学历层次、专业结构等方面提高与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的匹配度。

参考文献：

1. 蔡昉、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2. 郭丛斌：《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中国的验证》[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
3. 黄洪琳：《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差及原因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8年第S1期。
4. 柯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中国高教研究》2007年第4期。
5. 赖德胜、孟大虎、田永坡、李长安：《中国就业政策评价：1998-2008》[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6. 赖德胜、孟大虎、李长安：《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2012》[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7. 赖德胜、苏丽锋、孟大虎、李长安：《中国各地区就业质量测算与评价》[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第11期。
8. 李实：《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基于山西若干样本村的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9. 陆益龙：《户口还起作用吗—户籍制度与社会分层和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10. 苏丽锋、孟大虎：《扩招以来我国大学毕业生的供给与配置状况报告：基于统计年鉴数据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9期。
11. 王成歧、张建华、安辉：《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中国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02年第4期。
12. 王丽英：《市场化程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0年第2期。
13. 吴要武、赵泉：《高校扩招与大学毕业生就业》[J]，《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
14. 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J]，《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15. Anker, 2003, "Measuring Decent Work with Statistical Indicators"[J],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2 (142): pp. 147-178.
16. Bescond,D., Chataignier, A., Mehran, F.,2003,"Seven 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ent Work: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2(142):pp.179-212.
17. Calmfors, Lars, Forslund, Anders, Henmstrom, Maria, 2002, "Does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Work? Lessons from the Swedish Experiences" [D], IFAU working paper.
18.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D], Annual Review of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e EU: 2003-2004.2004, <http://www.eurofound.eu.int>.
19. Fredric K Schroeder, 1994,"Braille Usage: Perspectives of Legally Blind Adul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 Thesis (Ph.D.),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20. Ghai, D., 2003,"Decent Work: Concept and Indicators" [J],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2(34): pp.113-146.
21. Kuznets, S., 1971,"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M],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2. M.Salisu., 2002,"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EP and IS Countries"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 pp.92-105.
23. Marcello Estevão¹, 2003, "Do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ies Increase Employment?" [D], IMF Working Paper, WP/03/234,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cat/longres.cfm?sk=17019.0>.
24. Van Bastelaer, Aloïs, 2002, "Work Organization, A Dimension of Job Quality: Data from the Adhocmodule of the 2001 Labour Force Survey in the EU.

(ZH)